

對四十年代籌建 「聯合政府」的考察

• 張學繼

40年代中期，建立「聯合政府」的呼聲曾經喧囂一時，但最終仍被拋到了一邊，武力較量代替了一切。現在回過頭來，重新檢討這段歷史，似乎尚未過時。因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局面與那過去了的年代仍有着某種相似之處。歷史雖不一定會重演，但歷史的經驗無疑是值得注意的。

問題提出的背景

首先，這與當時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有關。在中共看來，國民黨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政黨，這個黨腐敗、無能，根本沒有執政的資格。因此，國民黨無疑應該打倒。但實際上，由於中共力量仍處於劣勢，而且人民群眾還沒有覺悟，所以暫時還不能直接提「打倒」國民黨的口號，還要等待，還應當繼續同它合作，在合作中改造它。關於這一點，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報告中講得很清楚。他說：既然國民黨這麼壞，為甚麼不提革命的口號，還要提與它合作呢？「原因是日本人還在面前，這是基本原因。外國人也要它。」「不要輕視國民黨的力量，雖然它已經沒有希望了，它還有相當大的反動力量。」另外，還要「照顧群眾」，「群眾還未覺悟，就要等待」，「現在要講必要的等候，所以提『改組政府和改組統帥部』的口號。」^①毛澤東還指出，聯合政府的實質就是「洗臉」政策，也就是以和平的辦法演變國民黨政權，使中國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指出，聯合政府的實質就是「洗臉」政策，也就是以和平的辦法演變國民黨政權，使中國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其次，與歐洲一些國家共產黨參加政府，與各方面的力量組織聯合政府的經驗與做法有關。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

利亞、東德等國家先後成立了以共產黨或工人黨為主體，包括各種政治力量的帶有聯合政府性質的臨時政府。1945年5月，法國在英美盟軍幫助下獲得解放。法國解放後，法國共產黨領袖多列士奉行「只能有一個政府，一支共和國軍隊和警察」的政策^②，將法共領導的幾十萬游擊隊併入正規軍，歸戴高樂領導的臨時政府國防部統一指揮。在此基礎上，法國於1945年10月舉行議會選舉，法共獲得159席，成為全國第一大黨，人民共和黨獲152席，社會黨獲142席。11月21日組成了以戴高樂（無黨派）為總理的三黨「聯合政府」。戰後法國，用民主與和平的方式迅速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與團結。

由於法國的情況與中國較為近似，所以法國的成功經驗特別為中國各派政治勢力所注目和嚮往。1945年8月，重慶大公報館出版了一本《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誕生》的小冊子，該書前言寫道：「這本小冊子……意在使國人能增進對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認識與瞭解。同時，法國的團結與復興，也是值得我們借鏡的。」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報告中也指出：大家看到，巴黎暴動，法國共產黨力量非常大，《人道報》的發行數等於各報的總數，現在法國是共產黨領導的，我們大家應該學習他們的經驗。「我們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大體上要走法國的路」^③。對於法國的經驗，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也很推崇。他說：法國以民主的方式迅速解決了內部問題，從而迅速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也必須用民主的辦法解決內部問題，使中國在戰後「得到應有的國際地位」，「法國是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榜樣」^④。

此外，美蘇的對華政策，也推動中國作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嘗試。二戰後期，世界局勢已經明朗，中國成為美蘇兩大強國在遠東地區爭奪的焦點。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出發，認為必須使中國「成為統一的自由的民主國家」，以便將中國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並使中國成為「遏制蘇聯勢力向亞洲地區擴張」的主要屏障。美國政府認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存在兩個主要障礙：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的存在，「自治性的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那樣的存在，乃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且實際上使政治團結不能實現。」^⑤二是國民黨是「一黨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針對上述情況，美國政府確定的對華政策目標是：一方面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加強國民黨政府；同時敦促國民黨政府實行民主改革，開放政權，吸收各黨派分子參加政府，建立類似歐美的「代議制」的「聯合政府」。然後，在此基礎上整編中共軍隊。這樣，即可不戰而控制中國。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先後派赫爾利、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關係，以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

中國的北方強鄰蘇聯，一方面不願意中國成為完全受美國支配的附庸國，因此支持中國以對抗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擴張；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對國民黨的力量估計過高，而對中共力量則估計不足，害怕過分支持中共而引發美蘇直接衝突，因而又盡量尋求同美國妥協。美、蘇在幕後幾經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如下交易：（一）蘇聯政府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一項同盟條約，表示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在中國領導地位的支持；（二）美國政府承認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特殊權益，以保障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因此，蘇聯對華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建立以蔣介石為領袖的「聯合政府」，避免內戰。

蘇聯一方面不願意中國成為完全受美國支配的附庸國，因此支持中國以對抗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擴張；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對國民黨的力量估計過高，因而又盡量尋求同美國妥協。



法國解放後，法共領導的幾十萬游擊隊併入正規軍，歸戴高樂領導的臨時政府國防部指揮，迅速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

「國共反映美蘇」，美蘇兩大強國的對華政策深深地影響和制約着中國抗戰勝利前後政治局勢的發展。

中國建立「聯合政府」的嘗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進行的。

各黨派對「聯合政府」的反應與主張

在中國，最早提出「聯合政府」口號的是中國共產黨。1944年9月15日，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四次會議上，中共參政員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第一次將「聯合政府」的主張公諸社會。1945年4月23日，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24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在報告中，毛澤東首先分析了成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他指出：英美蘇三大民主國之間「團結是統治一切的」，「這是一個決定一切的條件」。從此，「國際間的重大問題，必須以三大國或五大國為首的協議來解決。各國內部問題，無例外地必須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毛澤東意識到，世界形勢要求中國在團結中求統一，而沒有別的道路可走。接着，毛澤東指出，成立「聯合政府」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在抗戰勝利以前，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一切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中央政府；第二步，在抗戰勝利後，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黨各派與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政府。這個聯合政府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即「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

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毛認為，解放區政權是地方性的聯合政府，是未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模型。最後，毛指出，這個聯合政府還必須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而徹底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當時還只有八路軍、新四軍，「還很不夠」。因此，中國人民必須做一項責無旁貸的工作，這就是將國民黨政府的那些在對日作戰時經常打敗仗的，以反對人民、排斥異己與準備內戰為目的的軍隊，加以改造，變為人民的軍隊。這項工作應當由全國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來做。

中共將「聯合政府」的主張向社會公開後，中間黨派首先起來表示響應和支持。1944年10月10日，民盟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要求「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1945年10月，民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建立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大會提出，「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為此，民盟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民主化」的建國方案。具體說，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較多地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實行議會制、責任內閣制、司法獨立與地方自治制；在經濟方面，比較多地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以實現經濟的自由平等。大會認真研究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文所提出的設想在中國實現之可能性。大會指出：「聯合政府是中國和平、團結、統一的唯一途徑」，「是實現軍隊國家化，徹底消弭內戰、平息黨爭的唯一樞軸」。民盟認為，國共兩黨都有自己的黨軍，這是實現聯合政府的障礙。因此，民盟又提出了「軍隊國家化」的口號，要求國共兩黨放棄黨軍，把軍隊交還給國家。他們指出：只有軍隊「超然於黨派鬥爭之外」，「民主政治才能獲得有效的保證」^⑥。但實際上，「軍隊國家化」的真正含義是「要求共產黨放棄革命的武力」^⑦。所以，後來青年黨又把它概括為「國民黨還政於民，共產黨還軍於國」。

民盟提出的「軍隊國家化」的真正含義是「要求共產黨放棄革命的武力」。所以，後來青年黨又把它概括為「國民黨還政於民，共產黨還軍於國」。

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主張也得到了以孫科為代表的國民黨「民主派」的響應。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在國民黨內有着特殊地位。國民黨內「三駕馬車」體制瓦解後，形成蔣介石一人獨裁的局面。但孫科憑借其特殊地位，成為國民黨當權派中敢於與蔣介石「立異」之一人。1944年5月5日，孫科創辦《民主世界》雜誌，該刊標榜「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是自由的號角」^⑧。其宣傳基調是鼓吹「建立一個民主的代議政府，以實現孫逸仙博士的理想」^⑨。孫科經常發表文章和講演，抨擊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儼然是國民黨「民主派」的領袖。對於中共問題，孫科主張「用開明方法求解決」^⑩，堅決反對使用武力。孫科指出：抗戰勝利後，如再打內戰，一是「未必有絕對勝利的把握」，二是「世界情勢不許可我們打」。所以，「國內問題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決，不能用武力解決」^⑪。孫科主辦的《民主世界》還載文警告說：如果國共不幸兵戎相見，「那麼，其結果一定是兩敗俱亡，民主與統一均成泡影，抗戰的血汗所換來的國家獨立與自由亦必全部犧牲，陷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⑫。從上述前提出發，孫科贊同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他認為：「聯合政府是遵循民主的方式，在各黨派是參加政府共同負責，加強政府的效能」^⑬。孫科指出，這個聯合政府應當有一個各黨派共同遵守的綱領，其要點是：（一）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二）承認中國國民黨為現在第一大黨居領導地位，同時承認各黨派都應該參加政府共同負責；（三）

承認蔣主席是我們全國的領袖：（四）全中國的軍隊都應當促使其國家化。孫科認為，只要各黨派遵守上述原則，「就可以達到團結統一的目的」^⑭。

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則強烈反對「聯合政府」的主張。蔣介石在看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後，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蔣的國策顧問陳布雷看了後，也說只有兩個字：「內戰」^⑮。蔣還聲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⑯。因此，他對聯合政府始終採取嚴加拒絕的態度，並以「軍令統一」、「政令統一」來對抗中共的聯合政府要求。由於蔣介石的頑固立場，在抗戰勝利前國共兩黨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未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聯合政府」方案的形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終於取得了勝利。從此，如何解決國內統一問題就成為時局的焦點。

8月28日，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鑒於以往蔣介石一直對「聯合政府」持嚴拒態度，為使談判能夠達成協議，中共決定暫時不提聯合政府的要求。經過長達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簽訂了〈國共會談紀要〉，雙方確認「堅決避免內戰」，「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

1948年8月28日，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並簽訂〈國共會談紀要〉。



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商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

根據〈國共會談紀要〉，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與無黨派五個方面的38名代表。會議就政府組織、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等五個問題達成了書面協議。

大陸出版的歷史著作一直認為參加會議的代表有左中右三種勢力：左派是中共代表和部分無黨派代表，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主張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中間派是民盟代表（國社黨代表除外）和部分無黨派代表，他們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利益，幻想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右派是國民黨、青年黨、國社黨和部分無黨派代表，他們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堅持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這些著作指出在政協會議中，中共採取團結中間派，揭露與孤立右派的方針，從而使政協會議達成了有利於人民的協議。因此，政協協議是中共與民主黨派密切合作的結果。

如果上述說法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左派應是中共7位代表加無黨派的李燭塵、郭沫若，共9人；中間黨派應是民盟7位代表加無黨派的邵從恩、錢永銘、繆嘉銘，共10人；而右派則應是國民黨8位代表、青年黨5位代表、國社黨2位代表以及無黨派的王雲五、胡霖、傅斯年、莫德惠，共19人。顯然，右派代表人數最多。而按照政協會議議事規則，任何一方只要握有 1/5 的反對票，議案即不能成立。因此，右派在事實上始終掌握了否決權。如果，他們始終堅持「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那麼，政協會議就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因此，前述說法不能成立是顯而易見的。

筆者認為，政協會議協議之所以能夠通過，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干預。政協會議一開始，由於各黨派的主張尖銳對立，爭論異常激烈。經過十多天的討論，進展非常緩慢。這種情況引起了馬歇爾的不安。1月22日，馬氏秘密拜會了蔣介石，向他提交了一份由馬氏本人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草案），主張立即成立各黨派參加的「臨時國務委員會」以取代國民黨一黨的最高國防委員會。馬氏明白告訴蔣介石：「絕對必要與共產黨人盡早就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和軍隊達成一項協議。」^① 馬氏警告說：美國陸戰隊不可能長時間留在中國，國民黨在西北和東北的地位都已因蘇聯而嚴重削弱，如不採取變通辦法，目前的中國將得容易受到蘇聯下層滲透方式的損害，從而使共產黨的制度變得強大起來^②。蔣對馬歇爾的方案非常反感，並認為是「為共黨所不敢提者」^③。但懼於杜魯門聲明的威脅及馬歇爾掌握着援華大權，不得不虛與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④。之後，國民黨代表被迫在政協會議上作出重大讓步，使協議得以通過。

第二是中共的讓步。政協通過的協議與中國共產黨人原來的主張明顯地「存在着距離」^⑤，但中共認為，政治解決只能是互相妥協，因而也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相應作了讓步。這一點，周恩來在會後答記者時作了明確說明。他說：和平建國綱領與我們原來的提案有距離，政府改組我們主張國民黨最多不能超過三分之一，結果佔到半數，國民大會舊代表我們主張重選，而現在只是增

蔣介石對馬歇爾的方案非常反感，並認為是「為共黨所不敢提者」。但懼於杜魯門聲明的威脅及馬歇爾掌握着援華大權，不得不虛與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

加了部分黨派名額。

第三，國民黨代表孫科企圖利用政協之機，限制蔣介石的獨裁。孫科素來不滿意蔣介石一人大權獨攬的作風。政協會議時，孫科擔任國民黨代表團首席代表。他認為，聯合政府成立後，總統一職非蔣莫屬。於是，孫科便決定利用政協討論憲草之機，縮小總統在憲法上的職權，實行責任內閣制，自己將來做行政院長。1月9日，政協討論憲法草案，首先由孫科對國民黨所提的「五五憲草」作說明，他並聲明：「國民黨並不以此憲草為天經地義，一字不可易，希望大家研究修改。」^②而在這個問題上，蔣介石是堅持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絕對不可違反的」^③。由此可見，孫科與蔣介石對五五憲草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五五憲草」提出後，遭到中共和中間黨派代表的強烈反對，他們指出：「五五憲草若成為正式的憲法，將是世界上一部最不民主的憲法。」^④經過協商，各方代表推國社黨的代表張君勱重擬憲法草案，作為政協「討論之底稿」。張氏憲草的基本精神，「在調和中山先生五權憲法與世界民主國憲法之根本原則。中山先生為民國之創造人，其憲法要義，自為吾人所當尊重：然民主國憲法之根本要義，如人民監督政府之權，如政府對議會負責，即為各國通行之制，自為吾國所不能自外」^⑤。張氏憲草，形式上仍是孫中山的五權制，但實際上，立法院變成了英國式的眾議院，行政院成了「純粹的責任內閣」，行政院長相當於英國的首相，總統相當於英國的女王。對於張君勱的設計，不僅中共和中間黨派表示同意，孫科也表示支持。孫科主辦的《民主世界》雜誌還稱：「協商會議的結

1946年5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繼續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有關聯合政府的談判。圖為周恩來在上海與有關人士的合影。



果，在原則上可以說和我們的主張不謀而合。」²⁶正因為如此，所以國民黨強硬派後來驚呼：國民黨「被孫科出賣了！」²⁷

國民黨強硬派推翻政協協議

政協協議遭到了國民黨內強硬派的激烈反對。強硬派聲稱：「國民黨握着政權將近二十年，而不能消滅各黨派，反倒被迫開放政權給各黨派，這是國民黨的失敗。」²⁸他們叫嚷：「不能把統治權交給多黨政府。」²⁹

1946年3月1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強硬派將二中全會變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講壇」³⁰。據當時報紙透露，對於政協通過的五項協議，「全會討論多持異議」³¹。而政協憲草尤為攻擊的焦點。強硬派認為，中國將「因憲法而宣佈解體」³²。他們反對中共「省得制定省憲」的主張，認為這將「支解中國為無數獨立國家」，「足以造成『封建割據』的局面」³³；他們反對三權分立和多黨內閣制，認為「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³⁴。強硬派還對參加政協會議的孫科等人進行了猛烈攻擊，聲稱要撤銷他們的代表資格並加以處分，以致國民黨「民主派」「慄慄有作」³⁵。

國民黨強硬派認為，中國將「因憲法而宣佈解體」。強硬派還對參加政協會議的孫科等人進行了猛烈攻擊，以致國民黨「民主派」「慄慄有作」³⁵。

面對強硬派反對政協協議的鼓噪，孫科等人多次發表文章和談話，試圖維護政協協議。孫科指出：政協會議「成就很大」，「政協會議的成功，是國民黨的成功，也是國家的成功」³⁶。他批評強硬派「頭腦不行」³⁷，並告誡他們：對政協協議要「絕對避免作惡意的推測」³⁸。孫科派的鍾天心也在《民主世界》上撰文，呼籲遵守政協協議。他指出：國民黨在政協會議中「所作的讓步不過係一部分權利和名位而已，如果讓出一部分的權利和名位，可以避免人民的流血，可以換得國家的和平與統一，我們又何樂而不為？」³⁹當時輿論也曾寄望於國民黨內的自由分子，希望他們起來「推動整個國民黨向着民主的路徑前進，以救黨，以救國」⁴⁰。然而，國民黨內自由分子的力量畢竟太小了，他們的言論猶如空谷足音，根本無力扭轉局勢的逆轉。

在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公開號召對政協協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⁴¹。在這一原則下，二中全會最後通過五項決議，對政協五項協議進行了全盤修正，推翻了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則。二中全會還規定：「各黨派推選的國府委員要經國民黨中常會任選」。這些修正，推翻了聯合政府的基礎，「把各黨派參加政府變成請客」⁴²。對此，中共與民盟斷然拒絕參加。1946年11月15日，蔣介石宣佈召開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公開宣佈與中共及民盟決裂，「聯合政府」的談判走入死胡同。剩下的問題便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如何在戰場上見高低了。

「聯合政府」無法成立的原因

歐洲各國在戰後成功地建立起了「聯合政府」，從而避免了社會的再度大動

亂。為甚麼唯獨中國的「聯合政府」建立不起來？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點原因：

(1) 國共兩黨心理上的障礙

在歷史上，國共兩黨有過從合作到破裂的不幸經歷，兩黨關係破裂後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殘酷廝殺。抗戰爆發後，大敵當前，國共兩黨不得不停戰休兵，共禦外侮。但即使在這時，雙方心理上始終存在着嚴重的隔閡，以致磨擦衝突不斷發生。由於這些不幸和痛苦的經歷，使得國共兩黨彼此都對對方抱有強烈的疑懼和戒備心理，相互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感。就在重慶談判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黨內高幹會議上說：「積十八年之經驗，深知是這麼一回事，國共兩黨一定談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④③}中共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也認為，要蔣介石放棄滅共不可能。因此，他建議中共中央可以利用談判作為合法鬥爭的講壇，但是不要指望談判會取得成功^{④④}。而在國民黨方面，據孫科分析，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痛苦經驗，使得國民黨內一部分人早已成了「驚弓之鳥」，患有嚴重的「恐共症」^{④⑤}。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CC首領陳果夫反對「聯合政府」的理由中得到證明。政協會議期間，陳果夫在日記中憂心忡忡地寫道：國民黨「黨的組織不如人，黨的宣傳不如人，黨的訓練不如人」，「黨無基礎，共黨如來合作，則我危險。」^{④⑥}1946年1月20日，法國聯合政府總理戴高樂被迫辭職。22日，陳果夫從報上看到這一消息後，對法國「共黨勢張」深感不安。當即寫信給蔣介石，阻止與共產黨合作。陳氏聲稱：「政治協商會議必無好結果。且無論如何，共黨已得到好處，本黨已受害。……法國情形，……中國如行多黨政治，照現在黨、政、軍均未健全之際，頗有重蹈覆轍之可能。請臨崖勒馬，另行途徑。」^{④⑦}不僅陳果夫等人害怕與中共再度合作，蔣介石也一口咬定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是一個政治口號和一種滲透與顛覆的政治戰術」^{④⑧}。由此可見，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不幸經驗，國民黨當權派大都患有程度不同的「恐共症」，他們感到，與中共進行和平競爭，國民黨不是對手；若讓中共參加聯合政府，政權遲早要落入中共手中。國民黨當權派就是在這種先入為主的意識支配下打定主意不跳入中共佈下的「聯合政府」這個「陷阱」。

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不幸經驗，國民黨當權派大都患有程度不同的「恐共症」，他們感到，與中共進行和平競爭，國民黨不是對手。

試想，國共兩黨在這種猜疑和互不信任的心理狀態下，怎麼能夠合作呢？正如英國掌璽大臣喬維特勳爵當時所指出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根深蒂固的猜疑和不信任，是阻止和平的主要原因。」^{④⑨}

(2) 國共兩黨在軍隊與政權問題上的尖銳對立

由於國共兩黨存在嚴重戒備心理，使得兩黨在軍隊與政權等實質性問題上各持己見，寸步不讓，造成無法打開的死結。美國的如意打算是希望通過吸收中共參加政府，以換取中共軍隊的改編。而蔣介石更是始終堅持政令、軍令統一，也就是要中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但是，中國的情形與法國不同，中

共不是法共，毛澤東也不是多列士。在國共長期的殘酷廝殺中，毛澤東確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指出：大革命時期，由於中共只掌握了少量軍隊，結果蔣介石一發動政變，共產黨的自由也就完了。對歷史的傷痕記憶猶新的中共，不可能在軍隊問題上作出讓步。針對美國政府和蔣介石的企圖，毛澤東明確聲明：「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澤東不僅要堅守已有的陣地（解放區政權與軍隊），而且要通過建立「聯合政府」將解放區的政權模式推廣到全國去，同時爭取改造國民黨軍隊，使之變為「人民的軍隊」。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共不可能效法法共，通過與資產階級政黨結盟，在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基礎上，放棄軍隊走上議會鬥爭的道路。中國不可能簡單地重複法國的模式。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共試圖找到一條既能夠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又能夠確保自身地位與安全的可靠辦法。中共的一切努力都是圍繞這一點而進行的。英國上議院議員林賽爵士當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除非共產黨可以保留他們的軍隊，允許中共在聯邦的中國範圍之內，若干部分能夠獨立，能夠管制他們自己的經濟；否則，我們不能希望共產黨與國民黨組織任何聯合政府^⑤。這個分析可以說是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如果歷史可以假設，那麼我們可以設想，國民黨在政權與軍隊問題上採取務實態度，承認現狀，那麼國共兩黨短暫和平共處的可能是存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以美蘇為中心，世界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對峙的局面。一國之內，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因此，即使中國在二戰末期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建立了類似的「聯合政府」，也不可能長久維持，這是可以肯定的。

(3) 蔣介石對國民黨軍隊力量的錯誤估計

當時，國民黨內普遍有這樣一種樂觀的估計，即共產黨「絕對沒有力量將國民黨的政權用武力打倒」^⑥。據王世杰日記記載，蔣介石曾很自信而驕橫地對周恩來說：中共不能推翻國民黨和我，因此，必須與國民黨合作^⑦。蔣的言外之意是，中共只有聽他蔣介石的安排，才是唯一出路。由於對自己力量有如此的錯覺，所以蔣介石堅持除非中共接受他的前提條件，否則，他就不願與中共和平共處。蔣在發動全面內戰後，很樂觀地估計，戰爭「一定能速戰速決」^⑧。蔣的參謀總長陳誠更大膽，揚言「三個月至多五個月便能解決問題」^⑨。但實際上，國民黨的力量遠非如他們吹噓的那樣強大。戰爭的結果是國民黨一敗塗地，不到三年，就被中共趕出了大陸。這樣的結局，蔣介石是無論如何也估計不到的。

(4) 世界冷戰格局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美蘇由戰時的合作逐漸演變為公開的對抗。以美蘇為中心，世界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對峙的局面。一國之內，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反觀二戰末期成立了聯合政府的歐洲國家，為時不久，即宣告瓦解。在東歐、南歐和中歐的一些國家，共產黨憑借其實力將資產階級政黨擠出了政府；而在法國，資產階級政黨憑借其實力將共產黨擠出了政府。無一例外地，都變成了清一色的共產黨政權或資產階級政權。因此，可以設想，即使中國在二戰末期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建立了類似的「聯合政府」，也不可能長久維持，這是可以肯定的。

註釋

- ①⑤ 《北京檔案史料》，4期(1990)，頁64。
- ② 沈煥之主編：《法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568。
- ③ 《近代史研究》，2期(1989)，頁200。
- ④⑬ (孫院長昨發表談話)，《新華日報》(1945年2月16日)。
- ⑤ 《中英關係史資料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頁33。
- ⑥ 董之：〈願望中國民主〉，《自由論壇》，卷3，3期(1944年11月1日)。
- ⑦ 羅隆基：〈從參加舊政協到南京和談的一些回憶〉，《文史資料選編》，第20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
- ⑧ (告讀者)，《民主世界》，卷2，8、9期合刊(1945年5月1日)。
- ⑨⑩⑪⑫ 孫科：《三民主義新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28；頁70；頁67-68；頁60。
- ⑬⑭⑮⑯ 羅天心：〈理智的抉擇〉，《民主世界》，卷3，2期(1945年5月16日)。
- ⑰ (孫院長之負責聲明)，《民主世界》，卷2，4、5期合刊(1945年3月1日)。
- ⑱⑲ 《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629。
- ⑳ 《美國特使在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頁98。
- ㉑㉒ 《美國對外關係》卷9(1946)，頁141-43。
- ㉓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第七編(五)，頁71。
- ㉔ 《新華日報》，1946年2月2日社論。
- ㉕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頁415。
- ㉖ 魏科：《憲政之路》(香港憲政問題研究會，1940)，頁8。
- ㉗ 《大公報》(天津)，1946年2月26日社評。
- ㉘ 張君勱：〈中華民國未來民主憲法十講自序〉，《再生》(上海)，128期(1946年8月31日)。
- ㉙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頁221。
- ㉚⑳㉛ 《新華日報》，1946年3月14日社論。
- ㉜ 羅隆基主編：《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706。
- ㉝⑳ 《新華日報》，1946年3月10日社論。
- ㉞ 《新華日報》，1946年3月12日社論。
- ㉟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日社論。
- ㊱⑳ (孫院長談東北問題)，《新華日報》(1946年3月11日)。
- ㊲ 孫科：〈新時代的開始〉，《民主世界》，卷3，1期(1946年5月1日)。
- ㊳ 子野：〈自由分子與少數黨派〉，《再生》(上海)，151期(1947年2月15日)。
- ㊴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1日社論。
- ㊵ (張君發表重要談話)，《新華日報》(1946年3月21日)。
- ㊶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1059。
- ㊷⑳ 徐詠平：《陳果夫傳》(台北：正中書局，1960)，頁935；頁931。
- ㊸ 張其成主編：《沈鴻英蔣公全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1冊，頁422。
- ㊹⑳ 殷生譯：〈英上院激辯我國局勢詳情〉，《再生》(上海)，151期。
- ㊺ 《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第5冊，頁261。
- ㊻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226。
- ㊼ 《中央日報》(1946年10月16日)。

張學繼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憲政史。現正主持編輯《中華憲法思想總匯》。